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 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八九八年十月四日)

· 編者按語 ·

在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間，伯恩施坦以《社会主义問題》为总标题，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公然叫嚷要对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伯恩施坦的言論，引起了党内許多人的反对，他们紛紛要求党的代表大会对此表示态度。一八九八年九月底，伯恩施坦給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寄去了一份为自己的立場辯护的声明，坚持修正主义的基本观点。代表大会就伯恩施坦問題展开了激烈的討論。考茨基在发言中虽然駁斥了伯恩施坦的若干修正主义观点，却表现了严重的机会主义动摇。他对伯恩施坦采取了庇护和姑息的态度，竭力緩和会上对他的批判，掩飾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的原則意义。

· 提 要 ·

声称“我很不情愿发言，因为我必須同一个我曾經与之处于亲密的战友关系这十八年之久的人爭論”。伯恩施坦的文章“把很重要的問題提出来討論，这些問題对于我們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伯恩施坦

沒有使我們喪失勇氣，而只是促使我們深思熟慮，為此我們要感謝他。”

許多發言人受到這樣的責備，說他們對問題沒有發表任何新的見解，使代表大會大為失望。我擔心如果人們期望我說出某些特別新鮮的東西，那麼這一責備對我也將適用。我認為在我們已經進行過歷次大辯論以後，這是不可能的；一切決定性的觀點都已經提出來了。如果不是我的職務受到了攻擊並且我的沉默因此會引起誤解的話，我本來是不會發言的。問題在於伯恩施坦的文章。我曾經滿意地說過，沒有人因為我發表這些文章而責備我。各方面都承認，這些文章探討了很重要的問題，把很重要的問題提出來討論，這些問題對於我們的精神生活的發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人們僅僅責備《新時代》編輯部在發表這些文章時沒有提出反駁。提出反駁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儘管這些文章作為討論的對象很有益處，但是如果它們始終沒有受到駁斥，如果它們竟在將來對黨的策略起決定性作用，那麼它們一定會成為致命的。我只能說，再也沒有人比我自己更加因為這些文章沒有在《新時代》上引起討論而感到驚奇了。我曾經期待所有向伯恩施坦開火的人會在《新時代》上這樣做。《新時代》是黨進行討論的機關刊物。我曾經期待，尤其是盧森堡同志也會在《新時代》上攻擊伯恩施坦。但是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許多時間因此損失了；另一些人答應我寫反對伯恩施坦的文章，但是沒有給我，更多的時間因此損失了。在這一期間，普列漢諾夫的一篇文章^①發表了，另外幾篇將繼續發表。我的自覺性還不足以使我認為，我在伯恩施坦發表意見以後立刻對此表

① 指《伯恩施坦與唯物主義》一文，發表於《新時代》第16卷（1897—1898年）第2冊第44期（《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389—404頁）。——編者注

示态度是很关重要的。我认为，党并没有因为我沒有这样做而遭到任何損失。但是人們把我的沉默理解成贊同，或者象帕尔烏斯所說的，理解成不知所措。哦，我不需要反駁說我不不知所措的这一責备；但是对于认为我是因为《新时代》編輯部完全站在伯恩施坦的立場上才不作回答的这一看法，我想反駁一下。

我很不情愿发言，因为我必須同一个我曾經与之处于亲密的战友关系达十八年之久的人爭論，这个人在党的最艰难的时期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因此流亡在外，沒有可能在这里为自己的立場辯护。但是在应当消除模糊情况的时候，我們自然不能因此有所顾虑。我只不过将努力避免任何伤感情的話，并且不再加重討論的不必要的尖銳性。

你們已經通过倍倍尔之口听到了伯恩施坦的声明。我认为，尤其使整个党代表大会感到惊奇的是，伯恩施坦认为有必要把一系列根本不存在意見分歧的观点強調成特別必要的。如果他向我們說明，合法的道路在目前对于我們是有好处的，合法状态不会致我們于死命，却会致我們的敌人于死命，我們有进行民主的和經濟的改良的任务，有組織无产阶级的任务，那么每个人都一定要問：伯恩施坦說这些話干什么呢？党内难道有任何人不站在这一立場上嗎？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伯恩施坦同党失去了接触。我必須遺憾地說：伯恩施坦曾經根据报纸和許多演說中的个别詞句形成了对党的完全錯誤的看法。他认为我們是布朗基主义者，想拿一場武装力量的冲突来进行投机，等等。我相信，沒有一个党员同志是这样想的。

伯恩施坦还向我們說明，发展并不象許多人多半会假定的那么快。我认为，对于这一点也无需作同伯恩施坦相反的強調。对于經濟发展速度的假設是一个性情問題。

我不属于那些否定一切分歧的人；相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策略性的和理論性的分歧，這些分歧從黨成立以來就一直擺在那里，黨變得愈大，黨愈成為一個政治力量，這些分歧肯定還要加深；但是速度問題恰好是一個感覺問題，性情問題。但是伯恩施坦超出了這一點。他企圖用一些我完全不能贊同的論據來論證發展的緩慢情況。他對我們解釋說，有產者的人數、資本家的人數在增加，因此我們賴以建立我們的觀點的根據是錯誤的。的確，如果這樣說是正確的，那麼不僅我們勝利的時刻要大大推遲，而且我們根本不會達到目的。如果是資本家而不是無產者在增加，那麼發展愈向前進行，我們離開目的就愈遠，那末巩固起來的將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那末我們根本不會達到目的。但是我今天恰恰不想詳細討論這一點，因為這一來我就必須同伯恩施坦論戰了，而凡是在沒有必要的地方，我想儘可能避免同他論戰。否則我必須詳細談論職業統計和收入統計以及類似的東西，而黨代表大會不是這樣做的地方。但是肯定無疑的是，馬克思的這句話今天還是正確的：資本的增加也意味著無產階級的增加。

伯恩施坦還說，未來的歷史將不再在災變中發展，災變的時代過去了。他援引了恩格斯的許多話，認為可以證明這一點。我不能贊同他的這種說法。我現在不能精確地回憶出恩格斯的這一切引文，因此不能說它們的上下文聯繫怎樣；但是我知道我想不起恩格斯有任何一句話會證明從今以後沒有災變的可能。

我不打算用災變論來麻煩你們。我只想在這裡討論伯恩施坦的危機理論中在這里的會議上也引起了反響的那一部分，即政治危機和災變的問題。伯恩施坦認為，從現在起發展能夠和平地進行，當然不是沒有鬥爭，但是畢竟可以不經過大的災變。無產階級得到愈來愈多的政治權利，通過工會運動、通過在地方行政機構中的影響、通過建立合作社等等獲得愈來愈大的經濟權力，因此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將逐漸壓倒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直到后者有一天

融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止。这一看法被人认为是愚蠢的。不，伯恩斯坦的这一看法是以很可靠的事实为根据的。这一看法只有一个錯誤，而这也是我們的不幸，即这些事实在德国找不到，却要到英国去找。那么人們会说：是的，完全正确；但是英国的确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国家，英国給我們指出我們自己的未来。我不是这样看的。英国固然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但是英国就它的政治地位来说，就它在政治方面的发展规律来说，就它的政治趋势来说，是一个完全例外的国家。我們在英国看到的条件同全世界的都不相同。由于它的历史，由于它的島国的地位，我們在那里见到的是一个沒有军队、沒有官僚、沒有农民的国家，一种极其微不足道的农业——农业人口只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我們在英国看到，尽管经济是进步的，資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却比别的地方小，英国的資本已經变得过分龐大，不能仅仅在英国的工业中寻找容身之处了。英国資本投放在全世界；投放在英国工业中的部分相对說来将愈来愈小，直接同剝削英国工人有利害关系的资产阶級因此也愈来愈少。但是人类就本性来说是有同情心的，凡是在不同自己的利益抵触的地方，同情心总是要出来說話。因此我們看到英国的资产阶級支持工人罢工，而那里的资本主义公司却打算消灭工会。博爱主义在英国与在任何别的地方不同，是一种力量。因此在那里工人有可能在和平的道路上不经过灾变而逐渐取得权力。这是馬克思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經說过的，他写道，英国是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可能的。可能的！因为并没有排除灾变。如果工人使用了他們的政治权利（到目前为止他們沒有这样做），英国资产阶級将采取什么态度，今天的资产阶級那时是否会起来叛乱，反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我們今天还不能知道。你們在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找不到象英国这样的状态，即使在其他方面与英国有如此多的

共同之处的美国，你們发现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状态，暴力灾变的倾向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美国这样大，这样明显，单是美国就已经会推翻伯恩斯坦的理论了。但是我们欧洲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到处都是軍国主义的最发达的形态，到处都是专制主义地統治着的官僚，不仅在君主制国家中如此，在法国也是如此。此外我們欧洲大陆上大地产还起着决定性影响，资产阶级向刺刀的統治低头，它已經不再是一种民主力量。我們这里只有一种民主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我們也許还能够利用资产阶级青年时代的民主残余，但是资产阶级爭取新的民主权利的可能性已經被排除了，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伯恩斯坦认为，我們必須首先取得民主，然后才能一步一步地把无产阶级引到胜利，那么我要說，我們这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在我們这里，民主的胜利取决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沒有无产阶级我們根本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我承认，这对于我們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无产阶级沒有民主是不容易发展的。我承认，英国无产阶级所走的道路是較好的，它要求的牺牲較少，我們必須希望我們能走同样的道路；但是历史的进程不是由虔誠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事实决定的，而事实告訴我們，英国的道路對我們來說是行不通的，民主的胜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取得。

但是有一个人相信无产阶级的胜利有可能不經過灾变嗎？我但愿如此，但是我不相信会如此。民主和无产阶级将愈来愈被迫处于守势，自由主义已經让位了。资产阶级民主不是向前进，而是向后退，我們正处于反动势力得势的支配下。这是一个戈尔迪烏斯之結^①，它愈来愈复杂，我不相信可以用与解开那一个古老的結

^① 古希臘傳說中一个名叫戈尔迪烏斯的国王所打的乱結。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拔劍斬断，因此解开戈尔迪烏斯之結一語就是用快刀斬乱麻的手腕解決問題之意。——編者注

不同的方法解开它。我們看見歐洲到处都在酝酿着大灾变。奥国不是面临着灾变嗎？意大利不是面临着一場流血的灾变嗎？西班牙不是嗎？法国不是在酝酿着資產階級自由同軍國主義和教權主義之間的一場艰苦搏斗嗎？而德国的人們正在談論什么呢？难道是在談論扩大人民的权利、扩大結社权嗎？不是，人們在談論政变，談論取消选举权，談論監獄。这是我們可能有的前途，在这种前景之下，伯恩施坦所建議的道路是不能想象的。如果伯恩施坦是在我們中間，他会是第一个譴責这一道路的人，这是我的确定不移的信念。

艰苦的斗争等着我們，我們为了这些斗争首先需要的是對我們自己的信任，是胜利的信心。不是那一种也許会使我們低估敌人、輕率地挑撥敌人或者袖手等待的胜利信心；不，我們必須准备作沉重的牺牲，而这一信心只能是在于我們說：不管牺牲多么沉重，并且即使我們也要遭受暫時的挫敗，归根到底胜利毕竟是我們的。有人責备伯恩施坦，說他的文章削弱了我們对胜利的信心，束縛了无产階級的手脚。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如果我的看法是这样，那么当我作为一家社会主义刊物的編輯而接受伯恩施坦的文章时，当然是失职了。但并不是这样。我們對我們自己的信心不应当是盲目的信心，不应当以人們不加思考地接受下来的、現在也許已不再站得住脚的传统見解为根据；我們對我們自己的信心必須以日新月异的考察为根据。如果伯恩施坦的文章当真使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在社会主义信念上发生动摇，那么这只是证明，不值得为这些人感到可惜，他們的信念不很牢靠，他們会利用第一个机会就背弃我們，而那时我們能够因为这件事現在就发生、而不是一场我們需要每一个人的那种灾变中发生而感到高兴。不，伯恩施坦沒有使我們喪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們深思熟慮，为此我們要感謝他。但是我們不想按照他向我們建議

的道路斗争，我们要按照条件为我们规定的道路斗争，那时我们就会胜利。

《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八九八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柏林1998年德文版第126—130页。

[illegible]